

「我不是在做慈善，我只是讓他們有地方可以住」——芳春公寓房東李慶仁的低調庇護

採訪、撰文 | 陳虹汝

在嘉義市邊陲，芳春公寓的外觀看起來和一般的老舊集合住宅無異，甚至稱不上起眼。但這棟公寓裡46間不大的房間，卻是幾十位高齡、失能、流浪、被家庭遺棄或社會遺忘者的「家」。

「我們這裡總共46間房，一般來說有九成以上都住滿。這裡的住戶，八成是弱勢長者，有的是獨居，有的有殘疾，有的是家庭因素來這裡住的，甚至還有被社會局轉介來的無家者。」坐在自家樓下的騎樓，房東李慶仁說話不疾不徐，卻句句沉實。

芳春公寓並非社福機構，李慶仁也不是什麼官方認證的照護者。他是一位極度務實的民間房東，卻長年默默接納那些城市邊緣人。

● 「他們只是想有個地方住」

公寓原本是木板隔間，李慶仁在去年底斥資將整棟外牆包上了「一級耐火建材」，再加裝照明、消防等設施。「安全最重要啦，萬一出事他們連逃都逃不掉。」這些住戶大多年近七旬，行動不便，不少人領有殘障手冊。

他並非毫無條件地收租。「第一要會自理，不能連走路都不行。再來就是太髒的不行，曾經有那種劈頭散髮、身體臭到整棟樓都受不了的。還有酒癮重的、精神狀況不穩的，這些我們真的不敢收。」

雖說有門檻，但他的「寬容」早已超出一般房東的底線。在台灣的租屋市場裡，願意出租給老年人、無收入者、遊民的房東幾乎少之又少。「人家嫌他們老、怕申請補助會麻煩，還怕他們不能報戶口。我這邊都可以。」他語氣平淡，卻透露出一種自成一格的體制縫隙管理哲學。

● 「政府沒有合作，但會『來問』」

李慶仁強調芳春公寓並未與社會局簽署什麼合作協議，但社會局的人若接獲民眾通報在公園裡有遊民，仍會打電話來詢問：「你這邊有房間嗎？」

「如果有，我就讓他們來看。看起來有符合低收或中低收的資格，社工再幫他們辦補助。」他不會主動篩選誰該住誰不該住，「來這邊的人，大多也沒選擇了。」

從四、五年前開始，這樣的房東和社會局之間的「默契」成為某種非正式的社會安全網，撐起了這些無法進入體制內安置系統的人。

● 流動的邊緣：從「冬令救濟」到子女送養

過去曾有不少人夏天睡街頭、冬天才回來住。「那時候政務補助不多嘛，但現在冬令救濟多了，地藏王廟、城隍廟也會發錢，他們冬天可以住進來，有錢住到夏天就不走了。」現在，連這種「季節性入住」的比例也變少，「因為搬走可能就沒房間了，大家都怕失去。」

更讓人意外的是，芳春公寓也成了「子女送養」的集中地。「以前來住的老人多半沒子女，現在是小孩自己把爸爸媽媽送來。台北、台中都有，因為那邊房租貴，生活不穩定，乾脆送來嘉義。」他說，有些老人剛來的時候會抱怨，但住久了反而不想回去。「跟媳婦處不好啦，還是住我這邊比較自在。」

● 女性住戶的複雜故事

儘管這裡也收女性，但李慶仁坦言：「我現在不太敢收女生。」他搖頭苦笑，「有些女生背後的故事比較複雜，要問她們，她們也不願意講。男生還會說『我以前怎樣怎樣』，女生不會，她們都想把過去蓋起來。」

「有一個，孩子剛滿月就離家了；也有精神狀況不穩的，或是智能不足的。她們如果再牽扯到男住戶，就更難管理。」

李慶仁不諱言，這些看似庇護所的房間，其實就像一個社會濃縮槽，裡頭發生過的生老病死、男女糾葛、鬥毆爭執，樣樣都有。「以前也有夫妻一起來住，沒錢嘛，常常吵架打架。問題太多，很難處理。」

但儘管麻煩重重，他卻從未想過關門。

「昨天就有一位差不多昏迷了，我叫救護車送去醫院，再聯絡社工，這種我都處理得來啦。」

這些不是他本分裡的事，卻彷彿成了他理所當然的責任。他不是社工，不是慈善家，也不是救助組織的一員。但他知道，有些人如果連他這裡都住不了，就真的無處可去。

被醫療遺忘的人——在健保邊緣生存的無家者

採訪、撰文 | 陳虹汝

在嘉義市火車站外的長椅旁，64歲的楊伯伯靠著一罐止痛藥，與身體裡某處未明的疼痛周旋。寒意來襲，他拉了拉薄外套，笑著說自己「不知還能活幾年」。

他沒有健保卡。也沒有戶籍地址、穩定工作，更不用說固定收入。他是台灣全民健保制度的例外——或者說，是制度看不見的破口。

雖然衛福部統計指出，民國108年全民健保的滿意度高達89.7%，但對於街頭的無家者而言，這個數字像是另一個世界的事。他們長年暴露於風雨、無法保持良好衛生，一旦生病，卻沒有資源可依。他們不是不想看病，只是付不起那張門票。

● 「我又沒錢，健保費是別人的事」

「很久沒繳了，也沒打算繳，政府也不會來抓我啊。」楊伯伯說得理直氣壯，但語氣裡的坦然，多半來自無奈。

他靠回收、打零工維生，一個月賺不了幾千元，連下一餐都不保，健保費自然是最先被犧牲的。

同樣在嘉義火車站邊流浪的謝阿姨，一手扶著小推車，一手捧著胃部說：「我吃止痛藥吃到胃穿孔，那是藥不是飯，怎麼會不傷身體？」

問她為什麼不去看醫生，她回得很直接：「你給我錢我就去啊。」

她知道低收入戶才有健保費全免的補助，中低收入戶只能部分補助。但成為「低收」並不容易，需要提供家戶資料、財產證明、收入來源。這些條件，對於沒有戶籍、與家人斷聯的無家者來說，根本無法達成。

● 醫院的賒帳單與社會的緘默

嘉義人安基金會站長黃宸宏說，他看過無數次醫院在病歷上畫紅線：「列管」、「禁止看診」、「催繳中」。但現實是，無家者根本沒錢還。

「有的醫院還是會讓他們看，先簽單，欠帳。但也有醫院會不斷打電話催款。」黃站長語氣裡既感激也疲憊，因為每次協助個案進入醫療體系，都像走鋼索。

「你知道醫院有責任救人，但也不能怪他們現實，因為沒人會想當永遠的冤大頭。」

他們多半的處理方式是直接送急診。「沒有辦法，急診不能拒收。」這像是一種系統默認的灰色通道，對於經濟條件最差的人，是唯一的後門。

人安基金會督導社工蔡宗儒補充：「有的醫院甚至熟悉這些無家者的名字了，但也知道追討沒用。」這不是無賴，而是現實。

● 進了安置機構，就能得醫療照護？沒有這麼簡單

很多人以為，只要進入庇護中心或安置機構，問題就能解決。但事實遠非如此。

黃宸宏指出，即使入住機構，申請健保補助仍需一套繁複的流程與身份認定，無法一步到位。「我們要先轉介給衛生局，社工再做評估。最快也要幾週到一個月。」這段時間，病痛依然折磨著人。

即使成功核銷，政府一年補助的額度也僅約三萬元，對於需要長期治療的病患來說，根本杯水車薪。

● 制度的門檻，是用來阻擋還是保護？

2023年9月，衛福部終於宣布：將在年底實施補助65歲以上、無收入無家屬的老人，每月826元健保費。但對謝阿姨與楊伯伯這樣「卡在邊緣」的無家者而言，這項措施來得慢、也不夠。

人安基金會與其他社福機構正持續倡議：希望政府能放寬低收入戶的資格，讓無家者即使沒有戶籍，也能取得中低收資格與健保補助。

否則，這些年復一年生活在街頭的人們，將繼續在冬夜裡吞下止痛藥，靠毅力抵抗病痛，等待一張永遠到不了的健保卡。

- **活著，不該是奢侈的代價**

台灣的健保制度曾被譽為世界典範，但制度之所以能撐起公平，是因為不遺漏任何一個人。當無家者為了掛號費而在街頭徘徊，當止痛藥成為唯一能買得起的醫療，這套制度是否仍保有它最初的溫度？

「我不知道還能活多久。」楊伯伯說。

這不是誇張，而是一種對現實的老實形容。不是他們不想活得更好，而是活著的代價，對他們來說，實在太高了。

在指尖之間，他們看見世界——斗六火車站視障按摩師的溫柔專業

採訪、撰文 | 陳虹汝

在熙來攘往的斗六火車站旁，一盞暖黃色的燈光靜靜亮著。招牌不大，寫著「按摩小棧」，不喧嘩，不推銷，只是靜靜地等人走進來。推門而入，是一張張專注的臉孔，沒有視線的交會，卻有溫熱的雙手在顧客疲憊的肌肉上游移著——這裡的按摩師，都是視障者。

按摩小棧由雲林縣視障重建福利協進會設立，為的是讓視障者能在就業市場上站穩腳步，不只是「給他們一份工作」，而是讓他們藉由專業，重新定義自我與他人的眼光。

- **「我們是視障，但不是不專業。」**

「我們也要學人體解剖、病理學，還要懂穴道、經絡。」按摩師李先生說，這些都不是「天賦」，而是靠反覆練習與扎實訓練累積來的。「像十二筋絡，每一條要記，還要知道對應的症狀，按錯了可是會出事的。」

「這不是靠『摸久了就會』，我們也是讀書、考照才上工的。」一旁的陳先生補充。每位按摩師都必須經過學校或職訓單位的專業培訓，才有資格執業。

但再專業，生意卻也未必穩定。「平日有三、四個客人就不錯了。」假日稍好，卻也無法與商業按摩店相比。

這份差距，部分來自社會對視障按摩的既定印象，另一部分，來自政策轉向帶來的現實壓力。

● 釋憲以後，專業成為一場競爭

2011年，大法官釋字第653號解釋出爐，宣布「按摩業限由視障者經營」違憲，讓按摩市場從專屬於視障者的安全島，轉變成與健全者並行的競技場。

「我們知道不能靠保護活一輩子，但還是會有影響啦。」按摩師李小姐說，釋憲後，客源被分散，收入也明顯下滑。

為此，政府部門與協會開始合作推動「進修課程」、「據點補助」與「永續職涯轉銜」，希望讓視障者從傳統按摩行業跨入更廣泛的就業領域。例如：引介至企業任職，協助他們成為一般性職場的一員。

雲林縣勞工暨青年發展處的承辦人陳佳瑩表示：「我們每年會結合中央經費補助據點設備，也推動視障按摩師的就業媒合。像是結合西螺文化節或偶戲節，辦免費體驗活動，讓大家認識他們的專業。」

這些推廣活動除了讓視障按摩師增加收入，更重要的是，慢慢瓦解長久以來社會對「按摩」與「色情」的錯誤連結。

● 每一步路，都有人在背後推他們一把

按摩師們坦言，自己能夠一路走到這裡，其實並非單靠個人意志。「我們是慢慢一步一步出來工作的。學校有教，協會也幫忙，還有政府輔導。」李先生說，他們都算是「幸運的一群」。

除了按摩技巧的訓練，視障者也需要學會如何在城市中安全移動。「像我們從車站走到店裡，有導盲磚、手扶梯也有語音，廁所也有點字，這些設計對我們來說差很多。」陳先生說，生活中的無障礙，決定了他們能不能工作、能不能獨立。

而能在火車站設點經營，更是一種象徵。「這裡是人最多的地方，也是最能接觸社會的地方。交通部跟鐵路局，還有斗六站長，願意讓我們在這裡做生意，真的很感謝。」他語氣平實，卻難掩心中感激。

● 對抗「看不見」的偏見，他們選擇「做給你看」

在台灣，有視障的按摩師不在少數，但能像斗六火車站這般，穩定營運且獲得支持的，仍屬少數。他們靠的不是同情，而是專業；不是憐憫，而是努力。

李先生回憶：「早年大家聽到按摩，就會聯想到色情行業，我們一開始出來工作，真的很辛苦，怕被誤會。」

但時代在改變，社會觀念也在慢慢轉彎。如今越來越多民眾走進按摩小棧，是因為「信任這些師傅的手」。

他們的手，也許看不見世界，卻早已透過無數個肩頸與背脊，重新與世界連結。

成年人軀殼裡的孩子靈魂 智能障礙者自立之路的漫漫長路

採訪、撰文 | 陳虹汝

在我們熟悉的社會節奏中，有一群人以不同的步伐緩慢前行。他們擁有成年人的身體，卻停留在孩童的認知階段——這就是智能障礙者的日常。面對學習與社交的挑戰，他們需要更多支持與耐心。而隨著照顧者年歲漸長，如何走向自立，成為這群人與其家庭無法迴避的現實考驗。

● 難融群體 童年困境成陰影

謝馨怡是一名輕度智能障礙者，智力年齡約莫14歲，雖然看似與常人無異，卻經歷了格外孤獨的成長過程。

謝馨怡：「在小學也就過著被欺負、上下課這樣而已。跟媽媽說也沒用，只會讓同學變本加厲。因為他們知道我有身心障礙，就一直針對我。」

她的母親張秀鳳回憶起女兒的童年，語氣中難掩心疼。

母親 張秀鳳：「國小時沒人想跟她玩，國中也是常被排擠。後來校長建議她去讀建教班，她雖然學不到什麼，但至少能幫老師照顧其他身障孩子，讓她覺得自己也有用。」

● 社會偏見與家庭管控 壓抑的自由

多數智能障礙者的生活需要長期陪伴與管理。即使進入職場，也往往面對「工作有餘、獨立不足」的窘境。他們賺的薪水由家屬代管，難以享受基本的金錢自主與社交自由。

謝馨怡：「我賺的薪水都交給媽媽，她說我沒能力自己用錢。其實我只是想買些自己喜歡的東西，或是玩玩線上遊戲。」

即使努力就業，職場的接納度仍不一。

母親 張秀鳳：「她去便利商店工作，常找錯錢，有一次少了五千塊，我還得自掏腰包補回去。有的老闆能體諒她的狀況，但也有些直接冷言冷語。」

● 學坊培力 建構生活技能

在新竹，有一個為智能障礙青年設立的「恆星學坊」，致力於從日常生活訓練開始，幫助他們朝自立邁進。

恆星學坊延平據點 張老師：「我們會反覆教他們刷牙、洗臉、上廁所。這些看似簡單的事，需要無數次練習，才能內化成他們自己的能力。」

這些基礎訓練，逐漸讓學員掌握生活節奏，減輕家屬壓力。

楊同學：「我會自己洗澡、吃飯。」

吳同學：「我會幫忙倒垃圾、摺衣服。」

對於具備一定工作能力的智能障礙者，學坊也協助媒合就業與提供後續支持。

新竹市智障福利協進會總幹事 劉玉梅：「他們常不知道怎麼做選擇，我們的任務就是幫他們從團體生活過渡到獨立生活，讓他們知道：自己可以對人生有一點主控權。」

不只是障礙者本身，家長的心態轉變同樣重要。

母親 張秀鳳：「我們這些做父母的，其實誰不希望孩子正常？但我們能做的，就是幫他們多找一條出路，給他們多點信心與選擇。」

● 放手的練習 走向獨立的每一步

對於馨怡來說，被過度保護也意味著失去發揮的空間。

謝馨怡：「我常覺得我做什麼都被否定。她（媽媽）總說我這也不會那也不會，說我沒辦法照顧自己。這會讓人變得很沒自信。」

究竟該給予多少自由？又該從何時開始放手？這是許多智能障礙者家庭面對的難題。在這條通往自立的路上，沒有標準答案，但每一個選擇、每一次鼓勵，都是他們往前的一步。

從被安排的人生，到「選擇」的可能

智能障礙者不是不能生活，只是需要更多時間與支持學習生活。他們同樣渴望朋友、渴望被認可，渴望決定自己的一餐、一份工作，或一場旅行。讓他們有選擇，才是真正的尊重與成全。

如同劉玉梅所說：「我們的目標，是讓他們不要只是社會的被照顧者，而是能夠為自己的小小人生，負責一點點的人。」

房市高牆前的觀察者：房仲陳先生的現場筆記

採訪、撰文 | 陳虹汝

在預售屋銷售一空、市中心房價破表的現在，站在這片喧囂熱地中的，不僅有買不到房的年輕人，還有一群游走在供需之間、見證市場冷暖的房仲。陳先生就是其中之一。

他是今年度獲得「112年度風雲經紀人」的資深房仲，在房市起伏的浪潮裡工作超過十年，從低迷時代的慢工出細活，到疫情之後的瘋狂搶房，他從未缺席。

但說到現在的房市，陳先生只是皺起眉頭：「坦白講，我替現在的年輕人，真的感到憂心。」

● 疫情之後，房價變天

2020年，一場疫情打亂了全世界，也悄悄改變了台灣房市的節奏。熱錢回流、建材漲價、土地成本增加，加上民眾避險心態強烈，買房變成了投資手段。價格像吹氣球一樣往上飛，預售屋還沒蓋完就被掃光。

「以前買房是慢慢挑，現在是來不及看、先下訂。」陳先生說。

他看過不少年輕人帶著父母一起來看房，存了幾年的頭期款，卻發現根本追不上價格。「這兩年，房價幾乎是用跳的，不是漲，是飆。」

● 無殼蝸牛的痛 不是數字能解釋

過去，買不起房的人會退而求其次選擇租屋，但現在連租屋市場也隱藏著風險。

「冷氣壞了誰修？電費怎麼算？押金退不退？」陳先生熟悉這些問題，也提醒年輕人簽約時要格外小心。「很多房東會一筆帶過，但等到出事，吃虧的永遠是房客。」

他語氣有些無奈地說：「現在這市場，無殼蝸牛連殼都租不起。」

政策的美意，變成了另一種門檻

面對民怨四起，政府推動《平均地權條例》修法，限制預售屋轉售、加重稅負，希望打擊炒作。但站在第一線的陳先生，卻看見了另一種現實。

「政府是想要讓房價降下來，可是稅收成本轉嫁到消費者身上，反而讓房價更硬了。」他指出，原物料漲價、工人難找，加上高額稅金，讓建商更不可能讓利。

他停頓了一下，才接著說：「年輕人不是不努力，是這個遊戲規則本身就太難。」

- **他們不是不買，是買不起**

陳先生坦白，現在的成交量正在縮水，買賣雙方都在觀望，但真正想買的，依然買不起。

「現在買房要準備兩成自備款，大多數年輕人都得靠家裡幫忙。真的能靠自己存到的，不多。」他語氣放緩，「但也不是每個人都有這樣的家庭背景。」

在他眼裡，房價不是絕對不能漲，而是不能只漲。「房價可以漲，但薪水也要跟著走啊。你叫一個月薪三萬的年輕人，去扛一千萬的房貸，怎麼可能？」

- **他不只是賣屋的，還是記錄現場的人**

面對這樣的市場環境，陳先生說自己常常覺得矛盾。

「我當然希望市場熱絡，業績好。但看到年輕人連基本的生存空間都被壓縮，我也會想，這樣對嗎？」

他不是評論者，也不是政策制定者，只是一個在第一線看著買賣雙方角力的中間人。但他的眼睛，看得清楚現實裡的破口。

「我們不是不能接受辛苦，是不想被當成永遠買不起的人。」

他說，解決問題不只是壓房價，而是讓人有能力生活、有選擇、有希望。房子，是一個家的開始，但前提是，你要有能力踏進去。